

商业革命中的 文化变迁

朱英著

近代上海商人与
「海派」文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97
F729.5
52

商业革命中的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文化变迁

近代上海商人与

『海派』文化

朱英著

XAJ55/18

《东方商旅》丛书编委会

主编：严昌洪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 英 严昌洪 余东升 陈 钧

唐力行 葛贤慧

内 容 简 介

近代的上海商人,是当时整个中国商界最具实力、最有影响的商人群体;“海派”文化也是近代中国雄极一时、令人瞩目的新型区域文化。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大量的史实,从多方面叙述了近代上海商人的特点及其对“海派”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深刻影响,同时揭示了在“海派”文化的熏陶下,上海商人所独具的经营特色和政治风貌,并对“海派”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海派”文化的古为今用,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独到见解。

序 《东方商旅丛书》

章 开 沅

说“商人是人”，难免会引起公孙龙的传人们逻辑方面的非议；比较稳妥的说法为“商人也是人”，这样便无懈可击。

作为“也是人”的商人，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已久，但其传统的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则被贬之为末业。但在农业宗法社会，四民各有其特定的分工与职能，商虽位居其末，却又未能缺少，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渐趋于显要。作为非商的其他三民，特别是以社会正义代表自居的士，羡慕商的财富却又鄙薄其心术与行为。因此，在中国的文字记载中，商人大多与奸伪狡诈、奢靡挥霍相伴随，可圈可点的丰功伟绩并非甚多。

及至晚清，由于国门被迫开放与社会转型，人们的观念逐渐有所变化，重商主义与商战之论言者日多，商人的角色和形象都在明显提升。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商会的建立，中国商人的地位与作用更显重要。

1906年秋，章太炎发表于《民报》第8号的《革命之道德》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他按职业把社会成员分成16种人，并且认为“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章太炎当时虽热衷于倡导国粹主义，但在这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却颇能因应时势，改变了传统的四民序列。他按职业与道德两重标准厘订的序列是：“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

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商人从四民之末，一跃而为仅次于道德高尚、辛勤劳动的农民和工人，并且位列于三种士人（学究、艺士、通人）之前。他对商贾的评论亦颇平实：“裨贩者，有二种，其有荷蕢戴盆，求鬻于市者，则往往与农工相类。若夫千里求珍，牵车载牛，终日辎重不离身，其人涉历既多，所至悉其民情谣俗，山谷陵阪之间，有戒心于暴客，则亦习拳勇，知击刺，其高者乃往往有游侠之风，恤贫好施，金钱飞洒，然俦张为幻之事，亦稍以益多矣。坐贾者，倚市廛，居奇货，其朴质不逮农工，其豁达不逮裨贩。以畜为宝，以得为期，然不敢恣为奸利，懋迁有无，心济以信，其有作伪罔利者，取济一时，久亦无以自立，此则贾人自然之法式也。”中国传统商人以诚信闻名于世，但这一职业道德的形成必定经过漫长的岁月，以假冒伪劣谋取暴利可以得逞于一时，却无法取信顾客于长久。要从主客观两方面促成商人的道德自律，市场才能从无序走向有序，此即太炎所谓“贾人自然之法式也”。

此文值得推敲之处倒是作者对职商的评估。职商亦称绅商，实为商人之上层，且多为民族近代工商大企业的创始者。章氏列之为十一等，并且评估说：“职商者，非谓援例纳捐，得一虚爵，谓其建设商会，自成团体。或有开矿筑路通航制器，直隶于商部者。自满洲政府贪求无度，尊奖市侩，得其欢心，而商人亦自以为最贵，所至阻挠吏治，掣曳政权。已有欺罔赃私之事，长吏诃问，则直达商部以解之；里巷细民，小与己忤，则嗾使法吏以治之。财力相君，权倾督抚，官吏之贪污妄杀者不问，而得罪商人者必黜；氓庶之作奸犯科者无罚，而有害路矿者必诛。上无代议监督之益，下夺编户齐民之利。或名纺纱织布而铸私钱，或托华族寓居而储铅弹，斯乃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若夫淫佚烝报，所在有之，则不足论也已。”

读者不难看出，太炎当时已是革命家，所以他标榜的“革命之道德”实以政治判断为前提。同时，他又是一个文明悲观主义

者，认为道德（善）并非与文明俱进，而恶行倒是与文明俱增。所以此文明确指出：“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高于道德也愈远。”农人劳苦而又未经开化，平时畏服官府，但如对之诛求无度，也会起而为变，视死如归。工人虽略开化而稍知诈伪，“然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农工勤劳朴实，受压迫最深，反抗性最强，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因此被认定为道德序列的前端。裨贩、坐贾虽然朴质不逮农工，但与农工近而离官府远，可以作为争取的革命助力，因此在道德序列上仅次于农工而位于士人之前。至于通士以上，由于知识愈进，接近官府甚至进入官府，很难支持革命甚至公然反对革命，所以“离于道德也愈远”。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上层的职商，由于得到清政府的扶植与培育并且维护固有统治秩序，便被认定为道德序列之第十一，仅略先于京朝官与方面官，堪称“准革命对象”。

章太炎的16等道德“等次”的划分，如果从革命策略层次着眼，颇有点近乎后此30多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格局。但他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显然是从《周礼·天官·太宰》“六曰商贾”之类言词得到启发。他对进化论已持怀疑态度，更没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价值判断的第一优先。因此，他对活跃于清末民初且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的绅商的评判，就难免失之于偏颇。在太炎思想深处仍然存在着传统士大夫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情结。

其实，作为从士大夫转化为绅商的那一代创业者，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轻商情结。以状元下海而名噪一时的张謇，就曾把自己这一转化说成是：“以皜然自恃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即使已经成为大生资本集团领导人之后，他仍然没有舍弃传统道德理念。譬如，他对于金钱政治就极为憎恶。1921年他曾致函友人抨击时政说：“仆恶议会之齷齪久矣，此孽自项城（袁世凯）造之，而致项城之造此孽者又有人在。其故皆由于浮慕欧风，一若议会之有政党，政党之用金钱魔力，彼固有之。不知施于我国曾无一

致常识之人士，乃适得其弊。予金钱者，窃国而不止侯；受金钱者，窃钩而不胜诛。风掀雷颠，波谲云诡。凿混沌之顽窍，荡廉耻为灰尘，愈演愈奇，至有今日。”张謇的语言饱含悲愤，也相当平实。当时的中国商人，实力虽有所增长，但远远还不足以玩金钱（权）政治游戏，以金钱予受操纵政治者主要还是统治者本身，这与现今台湾地区的金权政治又有所区别。

中国商人虽然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还是生不逢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处境艰窘，市场与群体都未发育成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虽曾考虑过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适当发展，但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架已经预先确定要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并且要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而把资本家个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8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潮的日益泛滥，某些社会主义的设计师们甚至连市场经济也看作势必消除的异端，计划经济遂成为统驭全部社会生活的神圣模式。其灾难性的结果早已彰显，但我们则迟至70年代末才开始醒悟，原来“士农工商”的四民也好，或是“工农兵学商”的五民也好，都是缺一不可，各有其特定而又必需的角色与功能。固然这并非历史循环论的回归原地，人们宁可理解为螺旋式地向社会更高阶段发展，但时间毕竟已损失20年左右。何况，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变革，我们还没有任何更为卓有成效的先例可以仿行，一切都得靠自己不断摸索与创造。

不过，也不能说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丝毫不能提供借鉴，中国近代商人本来就是中西经济文化交会、冲突、融合的产物。历史条件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中国商人（包括传统商人与近代商人）所走过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其中确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供后世参考。而且，作为也是人的商人，其聪明智慧并不低于其他职业人等，特别是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更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写到这里，我偶然想到航运企业家卢作孚在30年代发表的一篇短文《麻雀牌的哲理》，现照录如下：

几块麻雀牌儿，何以会使乡村以至都市的人，下层社会以至上层社会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皆喜欢它，亲近它？这有一个很简单的答覆，便是搓麻雀已经形成功了一个坚强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的组织当中，有它底中心兴趣，足以吸引人群，足以维持久远而不致于崩溃。

搓麻雀是在一个社会组织当中作四个运动：用编制和选择的方法，合于秩序的录用，不合于秩序的淘汰。把一手七零八落漫无头绪的麻雀局面，建设成功一种秩序，是第一个运动。全社会的人总动员加入比赛，看谁先建设成功，看谁建设得最好，是第二个运动。到一个人先将秩序建设成功时，失败者全体奖励成功者，是第三个运动。去年偶同黄任之（炎培）先生谈到此段哲理，他还补充了一点，就是：失败了不灭心，重振旗鼓再来，这是第四个运动。这样的哲理，实值得介绍与国人，移用到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秩序上去，也许一样可以吸引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的兴趣于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建设上去。

（载于《新世界》第50期，1934年7月16日）

卢作孚当然无意于提倡全体国人都来学点哲学，但他通过打麻将因小见大，领悟出建设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重要与运动（游戏）规则，其头脑的精明与洞察之深刻确有过人之处。联想到此文发表四年以后，由于武汉失守民生公司不得不承担长江上游90%的航运任务。当时支前和后撤两重任务同时吃紧，大量西迁人员与10余万吨器材积压于宜昌，并且遭受日机狂轰滥炸。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同时又是接任未久的交通部次长，毅然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宜昌指挥，经过40天昼夜奋战，终于在宜昌沦陷前夕，将全部西迁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

而民生公司的船只与员工也遭到很大损失。中外誉之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克尔克”。可以想见，卢作孚当年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其气概与风采也不会略逊于一军之统帅。可惜这一代中国商人的精英分子，在1949年以后长期未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及至我们醒悟以后的改革开放，他们或者早已离开人间，或者迅即进入衰暮之年，人生的黄金时段一去不返。这不仅是他们个人或群体的重大损失，也是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只能说是时也，命也！但他们留下的业绩和风范都是永远值得后世尊重与传承的。

正是有鉴于此，严昌洪教授主编《东方商旅丛书》，以商人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中国商业文化中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经验和规律。这套丛书第一批出版者内容涉及到徽商、晋商、沪商、南洋侨商、潮汕商人、汉商和中国商事习惯等。可以看出，作为区域研究的布局，已涵盖了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国内与海外，大体上可以看出中国商旅文化和中国商人群体的整个轮廓。作者队伍以历史学者为主，他们既注意历史学与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结合，又努力突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衔接，并且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当然，出版物的价值与品位应该由读者自己来评判，无需我提前多发议论。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新一代中国商人的崛起和市场发育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仍然处于初级的甚至或多或少无序的阶段。商界人士每多诟病于投资经营环境的不够完善，却不甚强调中国商人的自我修养与品位提升，很多人还谈不上遵循“贾人自然之法式”的自觉。对于目前社会腐败和贪污腐化现象，中国商界亦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正如这套丛书所显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业文化对全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优化当前的商业文化，首要的任务是努力提高商人自身的伦理素质与文化品位。至少，当代中国商人的精英层应该显示更高

的精神境界与文化风貌。《新华字典》解释说：“商人就是做买卖的人。”做买卖当然要赚钱，但赚钱毕竟要遵守游戏规则，而且这并非人生的唯一目的。财富不一定会给财富所有者带来幸福，有时或许会带来痛苦，带来灾祸，甚至贻害子孙。关键是商亦有道，有其固有的伦理与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的殷鉴多矣哉！我希望有更多的商界人士阅读此书，增长智慧，知所抉择，迅速成长为活跃于中国乃至世界市场的明星。我也希望有更多商界以外的人士阅读此书，了解中国商旅的过去，对照中国商旅的现在，与商界人士一起营造中国美好的经济腾飞的未来。

1996年初夏于桂子山新居

目 录

序《东方商旅丛书》	章开沅(1)
前 言	(1)
第一章 “魔都”及其商人	(5)
一、上海:神奇的“魔都”	(5)
二、“魔都”中的商人	(11)
三、“魔都”商人的文化杂交	(20)
第二章 “乐园”及其西方的冒险家	(29)
一、上海: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29)
二、近代西方商风的东渐	(38)
三、近代西方商风的影响	(46)
第三章 “魔都”商人与“海派”文化	(56)
一、“海派”文化释义	(57)
二、“魔都”商人与“海派”文化的形成	(66)
三、“魔都”商人与“海派”文化的发展变迁	(75)
第四章 “魔都”商人“海派”经营特色	(84)
一、白手起家的上海商人	(84)
二、开拓进取的上海商人	(94)

三、精明强干的上海商人	(102)
四、推陈出新的上海商人	(110)
五、勤奋务实的上海商人	(118)
 第五章 “魔都”商人“海派”政治风貌.....	(125)
一、近代中国商界之翘楚	(126)
二、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商人	(134)
三、抵制洋货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141)
四、地方自治的首倡者与实践者	(152)
五、商界政治参与的先驱者	(159)
 第六章 “海派”文化的地位与影响.....	(176)
一、“海派”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176)
二、“海派”文化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184)
三、“海派”文化的古为今用	(196)
 后记.....	(203)

前 言

上海,是在近代崛起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它虽无西安、开封、洛阳、扬州、苏州等中国许多城市那样悠久的历史,也未曾像北京、南京等地作过富丽堂皇的都城,但在近代短短的半个多世纪,却奇迹般地从古代的一个普通县城一跃成为中国的最大都市,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和“东方明珠”,在远东乃至全世界也成为屈指可数的著名大城市之一。本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撰写一部有关上海近代史的著作时,将该书取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另还有学者称上海为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1989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本研究近现代上海的专题论文集,书名即为《上海:通往世界之桥》,这些都十分形象地反映了上海在近现代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学者们举凡论及近现代中国城市的功能,必然会首先将视线集注于上海。因为在近现代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上海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影响。通过与近现代中国的其他许多大城市相比较,不难发现上海非但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而且是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从文化事业方面看,上海也堪称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于上海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和斑斓的色彩,故而历来受到国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迄今为止,已发表为数甚多的论文,并曾出版了有关的专著。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大城市都是当时的政治统治中心,或者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大城市的发展与其

拥有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大城市虽也可称为工商荟萃的经济中心,但更主要的却是政治统治的重心,如果不具有政治统治中心的地位,这些城市将很难得到迅速的发展,因为它并非单纯由经济的繁荣著称,而主要是依赖政治或军事地位的重要获得发展。因此,中国古代许多城市在作为都城或军事重镇之际显赫一时,而一旦这种地位丧失即很快衰落,随后只能偶尔发出思古之幽情,在回忆中再现往日的辉煌。

上海在近代的崛起,则显然不是缘于其在当时取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也并非在军事上具有什么战略意义,而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结果。上海在距今一千年前尚名不见经传,700多年前的1291年方始正式设县。直至明末清初,在人们眼中上海仍然只是仅有10余条小街巷的“蕞尔小邑”,最耀眼的名称也不过是“小苏州”。19世纪40年代初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与以前相比其政治和军事地位并无多大变化,但进出口贸易却获得极为迅速的发展,很快即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转口贸易城市,现代工业、交通、电讯随之兴起,商业和金融也飞速扩展,跃居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国外及国内各地富商纷纷云集上海,为上海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也使近代的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与此同时,上海的市政面貌也发生了很大改观,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开始拔地而起,新建的宽敞街道四通八达,商业店铺满街遍及,一派繁荣景象。

显而易见,近代的上海走的是由商而兴的城市发展之路。较诸古代导致一些城市兴盛的政治原因而言,促使上海崛起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就推动城市发展来说,经济因素显然比不断变幻的政治因素具有更绵长持久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上海之所以能在近代崛起,与商业的繁盛和新商人群体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商业和商人在近代上海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换言之,“商”的风尚习俗在近代的上海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影响不仅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关系到近代上海的文化

特征。

在当今凡提及上海的文化，人们立即会想到“海派”文化这一十分流行的说法。事实上，“海派”文化几乎已成为上海文化的代名词。以“海派”概括上海文化的特征，并非始于今日。晚清时期，在上海的绘画及京剧界中即有“海派”之说。此后，“海派”一词的用法愈来愈广，举凡带有上海地方特色的事物均被冠以“海派”之称。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曾有轰动一时的“京海之争”，虽然在这场争论中上海的“海派”文人受到京城文人的猛烈抨击，但同时也使毁誉并存的所谓“海派”文化在全国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1949年以后，“海派”文化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代名词而销声匿迹。80年代的中国出现文化热高潮，上海知识界热烈讨论“文化发展战略”，“海派”文化再次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并由此使“海派”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并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据了十分明显的重要地位。

如果撇开当代而就近代而言，“海派”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海派”文化的主要特征，均与近代上海商业的畸形发展和社会的商业化不无关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近代上海商业高度发展对社会与文化强烈渗透的结果。即使就当今“海派”文化的再度兴盛而言，也不能否认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上海试图重振昔日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努力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直至今日，学者们在讨论“海派”文化时，仍认为商业化是“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征，甚至上海的一些学者对此也不讳言，只不过不再像过去的学者那样完全将这一特征视为“海派”文化的一大缺陷。在30年代初文坛“京海之争”的过程中，京城的文人就是抓住上海文坛的商业化“海派”习俗，予以言词非常激烈的抨击。当时，上海的文人似乎对此也颇感理亏，没有就这一指责作正面辩解，而是以京城文人同样具有类似的特性进行回击。

“海派”文化的商业化特征，集中反映了商业的发展对上海文化的直接影响。而上海商业的发展又离不开商人的苦心经营，因而

商人虽不属于文化人,但却与“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无联系。同时,“海派”文化对上海商人也有较大的影响,使上海商人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商人的某些特点。今天的上海商人,仍巧妙地利用“海派”文化的社会影响,推出各种名为“海派”的商品,诸如海派菜肴、海派服装、海派盆景、海派家具以至海派袜子等等。

综上所述,可知上海进出口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对近代上海崛起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海派”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也有着直接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对近代上海进出口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上海新兴商人群体的形成及其对于奠立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比较具体的考察。另还应分析上海商业的发展,从哪些方面对上海整个社会和“海派”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还应剖析在“海派”文化熏陶下,上海商人较为突出的某些经营特色及其政治风貌。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所要考察和叙述的主要内容。